

【经济与管理】

西安私营经济发展状况及不同时期的地位与作用

王圣学

(长安大学 城市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私营经济在旧中国是西安工商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间,西安的私营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恢复生产、鼓励发展;限制改造、公私合营;调整政策、适当发展;割资本主义尾巴、彻底消灭四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 25 年间,西安的私营经济也大致经历了缓慢恢复、初步发展、快速发展和高速发展四个阶段,现在已成为西安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之一。

关键词: 西安;私营经济;地位与作用;发展状况

中图分类号: F29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5)01-0013-10

Development condition of private economy in Xi'an and it's status and impacts in different period

WANG Sheng-xue

(Institute of Citi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Private economy is the main part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concurrent of our national economy in old China. From the founding of PRC to the implement of the policy of reformation and o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in Xi'an has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 regarding product and encouraging development, confine regeneration and joint state-private ownership, regulating policy and developing properly, restraining capitalism and eliminating completely. During these 25 years since the reformation and opening, private economy in Xi'an has also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 slow recovery, rudimental development, speedy development and high-speed development. And now private economy becomes one of the main forc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Xi'an.

Key words: Xi'an; private economy; status and impact; development condition

在旧中国,私营经济曾普遍存在,是当时社会经济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上把私营经济看成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格格不入、不能并存的异己力量;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直至改革开放前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长期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私营经济几乎被完全消灭,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经济成分也逐步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向多元化发展。其中私营经济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20 多年间发展最为迅速的,目前在整个经济总量中占据重要地位。

西安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曾经大量集中投资建设,国有大中型企业比较集中的一个工业基地,是中国最为重要的航空、航天、电子、机械、仪表、纺织工业中心。但由于体制

的原因,目前国有企业普遍活力不足,发展困难较大。同时,私营经济相对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发展较慢,水平较低。面对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和加入 WTO 的历史机遇,作为中国西部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开发大西北的桥头堡,西安不仅急需搞活国有企业,重振国有经济雄风,而且也迫切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使私营经济有一个大的发展,使西安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真正成为西北地区有巨大辐射力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和西部开发的根据地。

一、西安私营经济在建国前的发展状况及其地位与作用

西安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特别是在公元前 1134 年至公元 907 年长达 2041 年的漫长岁月里,先后有周、秦、汉、唐等十二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时间长达 1 229 年,列为中国七大古都之首,与古希腊的雅典、埃及的开罗和意大利的罗马齐名,被誉为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当时不但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中心的东移,首都地位的丧失,丝绸之路的废弃,自唐代以后,即从公元十世纪开始,西安逐渐从繁荣走向衰落,特别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由于地处内地,远离沿海,军阀混战不止,政局不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西安彻底衰落了。据史料记载:清末旧城区(明城墙以内及城关)人口只有 11.162 8 万;1869 年才有了近代机器工业,1889 年才有现代医院,1890 年才有了电报、通信和报纸及印刷厂,1904 年才有了官办的纺织厂和私营的火柴厂,1909 年才有了专营海外洋货即日用百货的商店,1912 年才有了官商合办的市内电话,1917 年才有了煤油发电机,市区才有了电灯,1921 年才开始修建公路,1922 年才开始有了汽车运输公司。直至 1934 年陇海铁路通车到西安,市区人口才逐渐增加,1936 年市区突破 20 万人。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沿海工业、人口的内迁,西安的私营企业和人口才有了较快的增加。据统计,1944 年市区扩大后,人口突破 50 万人,1947 年达到 62 万人,1949 年初因战乱降至 59 万人,其中城市人口为 39^[1] 万人。当时西安的工商企业除部分为官僚资本企业和政府官办企业如西京电厂、陕西机器厂、三桥车辆厂、雍兴公司、陕西企业公司化学厂、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办事处、中国石油公司西安营业分所和三十一兵工厂西安制造所及一些军事后勤系统

如被服厂、修理厂外,其余大部分工商业均为私营企业。据西安市工商局统计,截至 1949 年 8 月底,全市共有民族工商业即私营企业 11 531 户,从业人员 44 441 人,自报资金共 280 亿元(旧币)。详细情况如下:

第一,全市有动力设备机器生产的各种大小工厂共 253 家,其中:面粉厂 66 家;纺织厂 6 家;漂染厂 1 家;火柴厂 6 家;香皂厂 7 家;铁器修造厂 167 家。这 253 家工业企业占全市工商业总户数的 2.19%;从业人员共 7 839 人,占全市工商业人数的 18.57%;自报资金 168 亿元(旧币,约合新币 169 万元,下同)。

第二,全市共有手工业 3 048 户,其中:手工纺织业 1 043 户;缝纫业 578 户;金属器具工匠 440 户;其他行业 539 户。手工业总户数占全市工商业总户数 26.4%;从业人员 13 520 人,占全市工商业总人数的 25.11%;自报资金 71 亿元(旧币),占全市工商业总量的 13.3%。

第三,全市共有商品流通企业 8 230 户;从业人员 23 082 人,占全市工商业总人数的 56.32%;自报资金 40 亿元(旧币),占全市工商业资金总量的 18.3%^[2]。上述统计数据虽为战争年代新旧政权交替时所统计,不能代表旧中国西安在最高年份的私人工商业状况,但从中仍可以看出旧中国的西安经济落后,工商业很不发达,私营企业为城市经济的主力,但规模普遍较小,水平较低。当然,在当时的私营工商业中,也有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如纺织行业的大华纱厂,在抗日战争前已拥有 30 592 枚纱锭,820 台织布机,3 055 名工人,是当时中国纺织行业工艺先进、设备精良的大型纺织厂之一。其主要产品雁塔牌细布行销并驰誉西部各省区。只是到 1949 年和国民党政权即将灭亡之时,大华纱厂的资本家才开始收缩经营,抽逃资本并把大批纺织机械及配件运往当时还是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四川,并把厂里的流动资金全部带走,甚至把该厂在香港的 60.4 万美元外汇提走,造成该厂在解放前夕已生产停顿,工人流失,破败不堪。再如粮食加工行业的华峰、成丰、福豫、和合等面粉公司都是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建成的较大规模的面粉厂。这些厂当时均使用锅炉动力或发电机组,工艺设备比较先进,日产面粉各在 3 000~4 000 袋(每袋 25 kg 左右,日加工粮食 100 左右。再如火柴行业的中南火柴厂,当时有 300 多名工人,日产火柴 120 箱(每箱 2 400 盒),其产品雁塔、钟楼、巩固牌火柴,不但畅销陕西

及周边各省,而且远销西北各地。另外,化工行业的集成三酸厂、襄明玻璃厂、秦丰烟草公司等私营企业及商业的西京国货公司也都是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2]。此外,上述统计数字可能没有包括私人资本规模较大,数量较多的饮食、服务行业。据有关统计数据推算,包括餐饮、旅馆、理发、浴池、照像等行业在内的饮食服务业也有和商业规模相当(约 20 000 人以上)甚至人数更多的从业人员和营业网点。单从饭店与餐饮业来说,像西安饭庄、春发生葫芦头、同盛祥泡馍馆、德发长、义祥楼、一间楼、白云章、老孙家、大华饭店等都是历史悠久、名气很大、规模较大的餐馆、饭店。

总之,上述统计数据和分析说明,私营企业包括整个私营经济在旧中国是西安工商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主力军,这不但表现在数量、规模上,而且也表现在发展水平上。私营企业和整个私营经济在旧中国的地位、作用是和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二、新中国成立后前 30 年西安私营经济的状况及其地位与作用

1949 年 5 月 20 日西安解放后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间,西安的私营企业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恢复生产,鼓励发展;限制改造,公私合营;调整政策,适当发展;割资本主义尾巴,彻底消灭四个阶段。

(一) 恢复生产,鼓励发展阶段

西安解放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对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里曾有过详尽的论述。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

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3]

1949 年 5 月 20 日西安解放,5 月 24 日以贺龙为主任的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5 月 25 日以贾拓夫为市长、书记的西安市人民政府和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并开始对外办公后,在肃清国民党反动势力残余,整顿社会秩序,接管官僚资本和公营资产的同时,立即着手工商企业的开工开业、恢复生产的工作。市政府在宣告成立的当日即召集了全市工商各行业代表座谈会,宣布人民政府的城市工商业政策,军管会在成立的次日即由工商处在湘子庙街市商会召集有 700 多人参加各行业代表会议,分组讲解人民政府的各项工商政策,听取工商界对恢复生产和营业的意见和困难。据统计,由于工作抓得紧,西安解放一周内即有三分之二的商店和流通行业恢复营业,成丰面粉厂、中南火柴厂等当时西安较大的私营企业也都在西安解放后 3~5 天内相继恢复生产,并且产量达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西安当时最大的私营企业大华纱厂也在资本家逃跑,机器设备遭受严重的破坏下,经过军代表和技术人员、工人的努力,即在西安解放一个月后恢复生产。在庆祝大华纱厂复工典礼大会上,军管会主任贺龙亲自到会并讲话,强调对私营企业保护其合法经营,主张劳资两利等。在政府从政策到资金、原料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大华纱厂在解放后短短的几个月内,棉纱和布匹产量已达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这不但提高了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使资方提高了信心。该厂的上级裕大华总公司也于 1949 年下半年从外地调了一批技术骨干充实到该厂,并增拨 50 000 元流动资金投入生产;还于 1951 年初将解放前在国外和上海订购的 10 768 锭纺纱机、200 台织布机运回大华纱厂安装,扩大生产规模。这样,到 1951 年 11 月公私合营前,大华纱厂已拥有纺纱机 43 664 锭,织布机 1 000 台,资产总值 1 859 万元,职工人数 4 110 人,年产棉纱 38 350 件,棉布 772 260 匹,年生产总值 3 120 万元的生产规模,是该厂私营历史上最为鼎盛时期^[2]。

除大华纱厂、成丰面粉厂等厂外,西安其他私营企业在 1949 年底,相继恢复生产,而且有所发展。“如与解放前相比,12 月份面粉业增产 102.98%,布增产 113.92%,纱增产 100.68%,工业户数增加 125.42%,商业户数在 12 月底较 9 月份恢复和发展

了1/3以上。”^[4]在1949年下半年恢复发展的基础上,西安的私营工商企业在1950年以后的几年中,继续得到了新的发展。据统计,私营工业户1951年8月比1950年4月增加了915户,公营及公私合营的工厂比1950年12月增长了69%,而且不少新厂正在积极建设中。由于解放后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解放前已濒临破产的建筑企业,1951年7月比1950年4月增长了12倍。在私营商业方面,因政府加强领导,采取大力扶持的方针,经过银行贷款,调整负担,召开专业会议和物资交流会议,鼓励联营等措施,市场交易日趋活跃,私营商业企业发展很快。据统计,私营商业户1951年8月比1950年4月增加了1408户。根据37户营业额统计,1951年上半年比1950年下半年平均增长了65%。^[5]

总之,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到1953年底的国民经济恢复结束,大规模工业化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的约四年半时间里,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共同纲领》关于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在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继续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指引下,西安的私营企业和私营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二) 限制、改造,公私合营阶段

由于解放初期从没收接管的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转为国营企业的规模较小,力量不够强大,在整个工商业中只占大约10%,其余90%都是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户,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还需要利用私人资本和私营工商业及个体工商业户来发展经济。但是,从一开始就采取的是利用、限制和逐步改造的政策。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政策。对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曾有明确指示: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他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

的。”^[3]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解放后,政府就从恢复生产,鼓励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起,已逐步开始了对私营企业和整个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这一过程是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发展到公私合营。即通过夺取市场的领导权,把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农业产品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来控制私营工商业,通过供销合作社来控制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同时,通过加工费和商品价格给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以合理的利润,掌握合理的价格政策,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对于国家来说,订立加工订货合同以后,也就控制了私营企业的流通过程,切断了其与市场之间的联系,从而也就不同程度地控制了私营企业的生产。这样做对于消除不法资本家牟取暴利和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并按照国家的要求进行生产有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加工订货是国家能够控制其发展方向的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西安1949年5月20日解放,已在延安组建的市政府工商局及下属国营贸易公司5月22日进驻西安,5月25日与市政府同时对外挂牌办公。工商局和贸易公司当时有100多人,下设粮食、煤炭、花纱布三个分公司。开始的主要任务是对工商企业进行登记,帮助工商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等。这项任务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基本完成,1950年3月根据中央决定,相继成立了多个专业贸易公司,对私营企业开展加工订货、收购包销业务。据统计,到1951年底,各专业贸易公司也发展到48个,职工人数增加到700余人,经营品种达到2700多种,已基本控制了整个西安市场。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经销代销和加工、订货范围,支持和扶持国家和人民生活急需的产业、企业。解决原料、资金,扩大生产规模,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控制其发展。同时,还针对西安私营工商业基础薄弱,多为小厂、小店为主的特点,工商局积极组织中小私营企业进行联合生产经营。到了1952年下半年,即“三反”、“五反”结束后,西安市政府对全市的工商业重新进行了登记,并公布了家庭小型工商业登记暂行办法和私营企业登记补充办法。在此基础上,市工商局加强了工商行政管理力度,对私营企业进行产销调整,扩大了对18个行业的加工、订货范围,纠正了“五反”以后出现的宁左勿右倾向,调整了加工费以利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利用、限制、改造私营企业的同时,政府开始筹建国营的西安人民面粉厂、西安油漆厂、西安纺织厂、西安人民搪瓷

厂、西北国棉三厂、西安农业机械厂、西安矿山机械厂以及属于国家重点建设的灞桥热电厂等十几个工厂以扩大国营企业的规模和力量。经过解放后三年半的经济恢复时期,到 1952 年年底,不但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各项指标都大大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份,财政得到了根本好转,而且国营经济在全市工业中的比重也占到了优势,私营商业在全市批发和零售业中的地位有了较大的下降。

1953 年开始实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西安是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仅国家重点建设的“156 项”重点工程就在西安有 17 项,包括配套的、地方的工业项目,全市五年间先后就有 118 个国营大工业企业开工建设并陆续建成投产。加上 1952 年以前从没收的官僚资本转到国营和新建的国营企业 76 户,全市国营工业企业达到 194 户,国营企业不但数量多,而且设备先进,这就使设备落后、规模小的私营企业在竞争中难以生存。国家为使某些国民经济迫切需要的工厂能够迅速扩大生产,对私营企业投资,进行扩建、改造,实行公私合营。公私合营以后,生产上去了,资本家也有利可得。为此,许多私营企业要求从加工订货发展到公私合营,转变成成为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西安的公私合营是从 1951 年下半年开始的。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是规模较大的华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时间是 1951 年 9 月 23 日,为全市首家。其次是 1951 年 11 月 11 日实行公私合营的全市最大的私营纺织企业大华纱厂。到了 1953 年 8 月,公私合营的西北印染厂建成投产,同年 10 月,由 2 家公营建筑公司,17 家私营营造厂合并成立的市属建筑企业——西安市建筑工程公司(今市建三公司)成立,接着,全市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西安市第一木器合作社宣告成立。从 1954 年开始,加快了公私合营的步伐。国家把许多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逐步纳入了公私合营范围。当年 2 月 11 日,天祥仪器文具股份有限公司、新华机器砖瓦公司、黄河毛巾厂、福豫面粉公司、中南火柴厂、华西制药公司、新昌木器厂、西京国货公司、西安投资公司九家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商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这九家公司约占全市大型私营工商企业资本总额和从业人员的 30% 左右,年生产总值的 20% 左右。3 月 13 日,西安市搬运公司改组为地方国营西安市运输公司并统管全市运输。私营企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投资进行了扩建改造,生产发展很快,利润明显增加,公私两利,因而许多资本家也欢迎。随着第一个

五年计划时期国营大工业的迅速崛起和较大规模公司合营企业不断发展,使众多的中小私营企业日子更加难过,压力也越来越大,生存空间日益缩小。于是,它们也要求公私合营。但因这些小型私营企业数量太多,设备落后,国家无法对其单个进行公私合营和改建扩建,唯一的办法是使这些众多的中小型私营企业联合起来,改组成较大规模的企业,即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更高发展阶段。从 1955 年开始,不但公私合营的速度加快,而且开始向全行业公私合营发展。同年 2 月底到 3 月初,手工业合作社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西安市手工业生产合作联社;4 月 5 日西安市召开了第一次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 1955 年私营批发商、零售和郊区农村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案;9 月 10 日,154 户私营零售商店经政府批准成为国营西安百货公司的经销店。11 月底,为了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中共西安市委成立了以市委常委陈元方为组长的九人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全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工作。年底,全市 40 户棉布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面粉、玻璃、印染三个行业公私合营。1956 年 1 月,全市 101 个私营工商业行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31 个手工业行业全部实行合作化。与此同时,全市郊区农村 95% 以上的农户都已参加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 年 1 月 15 日,全市所有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资本家及其职员、手工业合作社社员及其家属共十余万人在市体育场集会,庆祝西安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1]。至此,西安的私营工商业和城乡的个体经济经过解放后六年半的发展、利用、限制、改造,到 1956 年初在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被基本消灭了;余下的少数饮食、服务业和小商小贩个体户及没有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民也在此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了!国营和集体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成为一统天下、独一无二的力量。这种不顾国情和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实际,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片面追求越大越公和急于消灭私人资本和小生产者的极左政策和做法,给此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不可弥补的损失。

(三) 调整政策,适当发展阶段

1957 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和“三大改造”的胜利,使骄傲自满情绪迅速在全国蔓延。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决策失误,从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持续的以钢为纲的经济建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大幅度减产,市场供应极为紧张,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再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到了解放以来的最低点,可以说是处在极其困难之中。这就是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纠正错误,渡过难关,从1961年1月开始,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降低发展速度,首先抓农业、轻工业,解决吃饭问题的大调整。即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一时期,为了解决城乡人民的生活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开始放松对城市工商业,主要是对小商小贩和农民自留地的控制,使城乡的私有经济有了短时期的适当发展。西安在1961年7月全面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的同时,首先是恢复农民的自留地和农村供销社;其次是给转入城市和合作商店及数千名小商小贩退还股金,允许其独立经营,并在全市开放了数十处自由市场,其中以东郊八仙庵自由市场最为著名;再次是开始调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改造和大跃进时集体化、国有化的312家手工业、地方国营企业恢复为公私合营工厂和合作社、合作小组,并允许城市手工业合作社适当发展。据统计,到1962年初,全市的手工业合作社由1957年的330家发展到890家,从业人员由2.7万人发展到4.5万人。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放松了对城乡私营经济的控制,促进了私营经济的适度发展,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粮食增产,城市商业网点和关乎人民生活的轻工产品增加,花色品种增多。许多合作商店和个体商业网点早开门,晚关门,游街串乡,又买又卖,市面显现出活跃景象;农村集市贸易的全面开放和农民自留地的增产增收,极大地活跃了农村经济,提高了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因调整时期中央和地方经济政策比较正确,特别是放松了对城乡私营经济发展的限制,从而使国民经济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发展,到1963年基本扭转了1960年到1962年间连续三年经济下滑的困难局面。^[6]

(四) 割资本主义尾巴, 彻底消灭阶段

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经济调整取得了胜利,全国的经济社会逐步获得了新的发展,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和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估计,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又开始大抓阶级斗争,开展城乡“四清”运动。这样,在三年困难时期

才略有恢复的城乡私营和个体经济又一次地遭到了限制、压缩。在此后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彻底地遭到封杀。

首先是1962年后,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城乡集市贸易不断被缩小、取代。据统计,到1963年底,西安市区自由交易市场由1959年底的近百处压缩到只剩下14处,到了1964年上半年,市区的自由市场被完全关闭。

其次是在1965年6月中旬召开的陕西省财贸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对小商小贩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认为西安和陕西的合作商业、合作小组和有证个体商贩的网点、人员偏多,经营额比重偏大;人员成分复杂,许多合作商店的领导权被坏分子把持;投机倒把活动和资本主义经营作风严重,应当加以清理整顿和适当压缩,对少数条件较好的合作商店,可以改为国营商店或农村供销合作社的零售单位并列入国营或集体商业机构的编制。这次会议后,即令农村供销社进入市区代替私营商贩,将旧城区东、南、西、北四关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和灞桥、三桥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以及中山门、油库街的废旧品市场等地的场地、人员、业务全都移交给供销社,所有经营肉食、青干果、蔬菜的商贩一律纳入供销社或国营商业公司进行改造。次年5月16日,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之时,陕西省政府(当时称省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将西安等地670个合作商店及其8134名从业人员分别转为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的零售单位并列入其编制。接着又在同年10月开始了对农村集市贸易的清理整顿。“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红卫兵组织勒令市区所有小商贩交证停止营业。当时仅剩下的281户未交证停业,但已无法公开做生意了。市郊和长安县当时只剩下21处农贸自由市场,但也名存实亡,几乎没有生意了。在以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些仅存的农贸市场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全部割掉了。到了1968年下半年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农村更出现了没收农民自留地归集体,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错误做法。因私营工商业和个体经济被彻底消灭,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时间的政治动乱,工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又一次造成了城乡人民群众生活基本必需品和日用消费品粮食、布匹、食用油、肉、蛋、糖等全面紧张,市场萧条,利用职权“走后门”购买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问题严重。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私营工商业和个体经

济被彻底消灭了,自由市场被完全取缔了,因而也就谈不上私营经济在西安的国民经济中有什么地位、作用了。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前一直都是如此。

三、改革开放以来西安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地位与作用

从 1978 年底改革开放到 2003 年以来的 25 年间,西安的私营经济也大致经历了缓慢恢复、初步发展、快速发展和高速发展四个阶段。

(一) 缓慢恢复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极左思潮的禁锢,人们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西安乃至整个陕西改革开放步伐非常缓慢,私营经济恢复发展步履艰难。直到 1982 年 9 月 22 日,中共 12 大召开后,新当选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西安考察,在陕西宾馆召开的省、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明确要求陕西省、西安市的改革开放步子要大一些,思想解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的讲话后,才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和私营经济的恢复发展。西安的私营经济是从开放自由市场、安置待业青年和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开始的。

首先,由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肯定了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为集市贸易为主的自由市场恢复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因此,1979 年底西安全市城乡自由市场即达到 107 个,其中市区 34 个,农村集市 73 个,当年城乡集市贸易交易总额达到 5216 万元,相当于当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的 2.9%。到 1984 年底,全市集市贸易市场达到 185 处,商品成交额达到 20247 万元,相当于当年全市商品零售额的 8.66%,个体工商户发展到 4200 多户,从业人员达到 58900 多人。自由市场的开放,使一大批城乡个体户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流通领域的生力军,为繁荣城乡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次,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数十万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和数万留城的待业青年就业的压力很大,市政府除在全市企业单位和行政机关成立了一大批劳动服务公司,创办了 3000 多个集体企业安置这些待业青年外,同时也号召广大待业人员从事工商个体户生产以自谋出路。这样,也使城市个体户迅速增长。据统计,到 1983 年全市的个体工商户发展到了 2.44 万户,从业人员 3 万多人。1984 年 9 月,西安市个体工商业劳动者协会宣告成立。

再次,1983 年 4 月,在农村延续了 25 年的政企

合一组织——人民公社宣告结束,政企分设,成立乡镇政府并在全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制度,使农村的个体私营经济也开始发展了起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在 1983 年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继颁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补充规定》、《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政策法规后,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使全市城乡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速度逐步加快。在个体私营工商户增加的同时,也先后建成了像东郊康复路批发市场、周至县哑柏刺绣市场、南郊李家村服装、旅馆村、端履门、柏树林商业街和高陵县年产 700 万公斤鲜蛋的千户农民笼养鸡基地等一批规模较大的市场。

(二) 初步发展阶段

1988 年 4 月,七届人大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对宪法做出修改,把私营经济写进宪法。明确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管理”。同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这一重要法律法规的出台,使西安的私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以个体户为主向以私营企业为主发展。据统计,到 1988 年底,全市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共 24 户。但此后由于 1989 年政治风波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解放后几十年来对私营经济的限制、改造以至于彻底消灭的政策,使大多数个体私营工商户心有余悸,怕政策再变,不敢领取私营企业执照,使一大批私营企业戴着“假集体”、“假全民”的帽子继续发展。因而,直到 1991 年底,全市私营企业只有 802 户,从业人员 12853 人。无论数量和规模都是很小的,与东部城市相比,差距很大。加之西安国有企业比重大,受体制的影响,活力不足,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效益不好,从而也影响了整个西安的经济发展速度。

(三) 快速发展阶段

1992 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确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使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了体制上的保证。西安市各级党委和政府以邓小平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放宽政策,从而使私营经济的发展迈入了快车道。此后私营个体经济不仅在经营规模上扩大了,而且在经营领域上也不断扩展。从开始

主要为商业流通向生产型、科技型发展,而且还有一些实力较强、规模较大的企业向科技开发、医药、信息、房地产发展。据统计,到1995年底,全市当时共有私营企业4861户,从业人员80536人。分别比1991年增长了606%和626%。同时,个体工商业户从业人员也发展到72000多人。

(四) 高速发展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党政领导已认识到加快发展私营经济对地方经济的重要性。为此,从市委、市政府到各区县、乡、镇、党委、政府为此花了很多精力,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鼓励、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如1994年5月,市委、市政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下发了《关于鼓励个体私营发展的若干意见》,1995年4月,又在户县召开了发展非国有经济座谈会,重点讨论了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坚持五个不限措施,即不限发展速度,能发展多快就发展多快;不限发展比例,能发展多少就发展多少;不限经营范围,除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业和产品,都可以经营;不限经营方式,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科研一齐上;不限经营规模,能发展多大就发展多大。1996年初,又邀请理论界、工商业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召开了私营经济研讨会。同年4月,在陕西省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市委、市政府分别召开常委会和市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私营经济的发展问题,并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同年8月,召开了全市个体私营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了《西安市个体私营经济九五发展规划》。1997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以中共十五大精神为指导,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市情出发,站在新的理论高度对私营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新的认识,结合本市,制定出台了《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实施意见》及14个相关配套政策,并号召全市各界人士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抢抓机遇,深化改革,去掉“怕”字,清除路障,放心、放胆、放手加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使全市的私营企业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迈上了快车道。特别是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从法律上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作出规定,明确指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此后,私营企业和整个私营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根据来自西安市政府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0年11月底,全市个体工商户发展到200772户,从业人员488890人,注册资金364757万元;其中有30户私营企业组建了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集团;三资企业也发展到1567户,其中中外合资企业1052户,中外合作企业238户,外商独资企业285户。到12月中旬为止,全市个体工商户完成总产值21亿元,销售总额14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0亿元;私营企业完成总产值近62亿元,实现销售收入近96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额57亿多元;三资企业的产值和营业额也达到40亿元。上述统计数据表明,在新世纪到来之前,西安市以私营经济为主的非国有经济在全市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上升到30%,从而使之成为全市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一大支柱。

据调查,最近几年来,西安市私营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六大特点:

一是发展速度快,总量持续扩张。自1996年以来特别是1997年底中共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两个决定出台以来,全市个体工商户新增6万多户,私营企业新增13000多户,分别增长了49%和136%。新增户数和从业人员数量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

二是经营规模、行业和领域不断扩大。最近几年来,私营企业经营规模正在逐步扩大,据统计,目前私营企业户平均资本为37.24万元。注册资金100万元以上的企业已有600户左右,最多的九龙食品工业公司注册资金达1.5亿元。全市年生产总值超过千万元,纳税超百万元的企业已有20户。户县轻化电缆有限公司年纳税达140万元,被列入“中国大陆私营制造百强企业”第46位。经营范围也已由过去主要从事简单的工商生产、加工、流通、餐饮、服务业逐步向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科技开发领域发展。产业型、外向型、科技型、资本密集型企业不断增多。

三是产业结构发展日趋合理。虽然目前全市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经营的行业仍以第三产业为主,但第一、第二产业的比例正在逐步增大,特别是科技开发型企业正在快速增长,这是和西安科技教育力量雄厚,科技人才众多有密切关系的。

四是组织形式日趋规范化。这主要表现在符合公司法的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全市私营企业的首选模式。这是私营企业发展成熟的表现,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所要求的。

五是逐步从分散走向集中。全市私营企业最近几年来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正在逐步改变过去各自为政、分散经营的局面,日趋走向集中经营。据了解,现在全市已出现 40 多个以私营企业为主的工业村镇和 20 多个工业园区。规模较大的有临潼国家级私营经济开发区、周至的种植业、哑柏的刺绣业、户县的私营经济园区等。

六是从业人员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初期,其从业人员主要由社会闲散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城镇待业青年组成,整体素质较低。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退休、下岗的工程技术人员、高中级管理人员、大专院校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甚至党政机关干部、留学回国人员加入到私营企业队伍中来,使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的文化知识结构和整体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七是外贸进出口增长较快。自 1999 年 1 月国家外经贸部给予私营企业自营进出口权后,最近几年来,全市的私营企业进出口贸易额增长幅度较大,已成为全市外贸行业中的一支生力军,据西安海关 2000 年 1~3 季度统计,私营企业出口额为 1 124 万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达 4.6 倍。2000 年 12 月中旬,国家外经贸部发出通知,为了深化外贸经营体制改革,推动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进入国际市场,决定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对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的资格条件按国有、集体、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同等的标准执行;同时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条件还有所降低。相信此政策的出台,将使西安的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党的十六大关于必须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精神指引下,西安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及市级十八个部门的相关配套措施,使西安市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逐年提高,支持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据统计,1997 年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以年均 17.6% 的

速度增长,高于全市 GDP 平均增长速度 4.6 个百分点,到 2002 年末,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达 307.16 亿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 37.3%,比 1997 年的 28.1% 增长 9.2 个百分点。到 2003 年底,西安市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达到 39.3%,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6.4% 以上。

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加了社会就业,已成为西安市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2003 年末,全市国有经济从业人员 100.54 万人,比 1997 年减少 11.9 万人,而城乡私营经济及个体劳动者达到 40.4 万人,比 1997 年的 29.03 万人增加了 11.37 万人,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增长量的 94.6%。到 2003 年底,全市累计登记个体工商户 20.52 万户,从业人员 49.17 万人,注册资金 36.35 亿元;私营企业累计 35 291 户,从业人员 38.80 万人,注册资金 324.61 亿元,外商投资企业累计 1 762 户,投资总额 58.37 亿美元,注册资本 35.83 亿美元,外方认缴 25.4 亿美元。

三是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投资领域不断拓宽。1997 年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以 33.6% 的年均速度增长,到 2002 年底,非公有制经济投资达到 124.4 亿元,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36.8%,比 1999 年提高了 11.8 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除服务业和一些传统产业外依托西安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优势,其投资范围已涉及到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生态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多种高科技领域,已经成为推动城市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产业的重要力量。

四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非公有制经济分布的重要领域。2002 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中,第一产业占 6.1%,第二产业占 45.6%,第三产业占 48.3%。

上述统计数字仅为在市和区县登记注册的个体、私企情况,尚不包括在陕西省工商局注册登记的一万多户个体私营企业情况。

总之,纵向比较,可以说,西安市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但客观地讲,与沿海及其他经济发达城市相比,西安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不够高,占全市经济总量的比重还比较低,知名大企业和品牌产品还比较少,市场竞争力还不够强,加上一些体制性障碍还未根除等,制约着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还有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服务方面

也还存在着较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将是西安市今后工作的重点。

参考文献:

- [1] 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西安市志(第一卷·总类)[M]. 西安: 西安出版社, 1996
- [2] 刘升昌. 解放初的西安工商经济[A]. 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西安卷)[C].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6
- [4] 方仲如. 新西安在成长中——为庆祝首届国庆而作[J]. 西安市政, 1950(12): 1—3
- [5] 方仲如. 两年来的工作[N]. 群众日报, 1951-09-30(2).
- [6] 李平安, 等. 陕西经济大事记(1949—1985),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陈志和]

(上接第12页)

(3)关于路桥收费问题, 本文希望国家能够通过调整现行路桥收费政策, 允许公路上市公司能够取得弹性的收费经营期限, 不再受“收费经营期限不得超过25年或30年”的限制, 使得投资原本效益较差的高速公路项目也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 允许公路上市公司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调整收费标准, 以利于用价格杠杆影响交通量, 争取增加公司利润; 允许采取收费经营制度提供高速公路养护、扩建与技术改造资金, 在保证高速公路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促进公路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4)关于税收特殊政策问题, 本文主张调整现行营业税政策, 包括允许公路上市公司按照3%的税率缴纳营业税, 或者在按照现行5%的税率缴纳营业税的基础上, 执行2%营业税返还的政策, 以利于公路上市公司提高获利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主张持续按照15%的税率交纳所得税, 直至公路上市公司不再履行发展本地区公路建设事业的社会职责时为止。

(5)政府在要求公路上市公司投资建造所在地区高等级公路基础设施的同时, 应当赋予公路上市公司经营性公路建设项目的优先选择权; 赋予公路上市公司必要的公路沿线土地开发权, 维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在投资政策上扶持公路上市公司可

持续发展。

(6)特殊政策对应的是公路上市公司应当履行的社会职责。如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现行政策的调整以及政企关系的真正理顺, 公路上市公司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各自在公路收费经营中的权利、义务和职责)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的特许经营协议来规范, 公路上市公司能够真正走向市场, 自主筹资, 自主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向和经营领域, 不再受政府的直接影响和干预, 则政府也就没有必要对公路上市公司提供优惠政策。公路上市公司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 完全取决于公司自身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努力; 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也完全适用于公路上市公司。

参考文献:

- [1] 路成章. 公路交通经济范畴内若干问题的研究[M].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1
- [2] 亚洲开发银行编著. 基础设施市场化运作——中国收费公路[M]. 北京: 人民经济出版社, 2003
- [3] 周国光. 中国道路收费与融资问题研究[A]. 中国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战略. 中国工程院第32场工程科技论坛论文集[C].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陈志和]